

# 语义上行和眼光向下的解读反思

李红章<sup>1</sup>, 李岩<sup>2,3</sup>

(1.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2.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长春, 130000;  
3.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吉林长春, 135000)

**[摘要]** 马克思思想有着一种价值先行, 通过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的价值立场切入到对世界的重新解释, 并以此实现新的价值实践。教科书的“理解-传播”模式截取了这个循环的一个环节, 把其作为解释世界的科学性放大。通过中国的历史现实背景来分析这种解读模式的现实基础, 并指出这种被叙述为科学的哲学很难在逻辑的层面被完全拒斥。同时, 对哲学科学化拒斥态度本身也有着重要的现实基础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 科学; 唯物主义; 真理; 价值; 民主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 黑龙江大学博士启动金项目前期成果

**[作者简介]** 李红章(1979-),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思想, 一直是一个常谈常新并富有魅力的话题。在这个大的问题领域下, 我们今天的讨论往往又绕不开传统教科书的“解读-传播”模式。教科书把马克思思想打造成了一种科学, 而这种做法在今天却遭遇到了复杂的论争, 支持者对此感觉任重道远仍在途中, 批判者对此感觉则是南辕北辙回头是岸。对待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寻求一种语义上行和眼光向下的方式并尝试去反思。所谓语义上行, 即通过分析诸如科学、唯物主义、哲学等概念的涵义与衍生义, 以此区分出不同概念框架的理解歧义, 以至于达到一种理性的理解与宽容。所谓眼光向下, 就是分析各种观点背后的历史现实背景, 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考察这种论争的现实基础, 以求获得一个冷静的判断。在这样的一种致思方式的启发下, 我们可以简单地审视一下马克思思想的产生, 考察一下真理与价值的微妙关联, 反思何以在中国马克思思想被理解和叙述为是一种科学, 而又为何在今天, 科学化了的马克思思想却又遭受到了质疑。这其中关联的“概念”问题是什么, 而更重要的, 它所关联的历史现实背景是什么。

## 一、真理与价值的循环

马克思在1843年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一封信中谈道“……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 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sup>[1]</sup>从这里我们能够发现, 其实马克思将自己的思想产生过程做了一个简单描述。这个过程是, 先有一个“批判”, 而这个批判是一个手段, 通过这个手段, 马克思要实现一个目的, 即发现新世界。这是一个展开真理的过程。

说到真理, 这是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概念, 我们会把马克思的思想表述为一种真理, 这种表述模式在教科书哲学体系中常常见到。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即这个真理的新世界的发现为什么要通过“批判”? 这种“批判”意味着什么? 以及从哪里切入进行“批判”?

真理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对近似词。科学的发展也是在“批判”下进行的, 抛开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革命(那是一种范式完全被不可通约的方式切换掉), 科学史常常是一种累积式的进步, 科学的发展是通过发现错误、批判错误、进而提出新的解释原则的过程实现的。这种科学式的“批判”一定是发现了一个主观印象与客观事实不相符的“错误”才得以成立的。所以科学常以客观性自诩, 虽然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在更广阔的科学史考察后对此进行了苛刻的批判。

科学的这种来自于对客观的忠实的先见,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我们常常理解一个哲学的真理也一定是比先前的哲学思想具有更大的客观性, 从对马克思哲学的科学真理式的表述中我们不难体会这一点。但是, 哲学真理的批判绝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站在一个资本家的位置上思考问题, 我们很难想象在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在数字上的运算会有什么“错误”, 而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 才会通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英明之处。正如马克思评判李嘉图时所言,“(他)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 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 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sup>[2]</sup>所以哲学的真理不是一个简单而纯粹客观的数学问题, 它内涵着一种价值的倾向, 只有在后者的立场下才会通晓这种深刻的“正确性”。

价值立场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即首先拥有一种价值层面的关照, 才可能“继续”言说。马克思曾经以“羞耻”作为一种对“价值立场”的文学表述, 他写道, “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实际上是法国革命对1813年曾战胜过它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胜利, 羞耻是一种内省的愤怒。如果整个民族真正感到了羞耻, 它就会像一头蜷身缩爪、准备向前扑去的狮子”。<sup>[15]</sup>正因为有了作为“羞耻”的价值感受, 成为“愤怒”, 才会驱使真正的思想家去“批判旧世界”。而同样应该看到, 如果没有为无产者“发出声音”的这一价值立场, 就

不会有马克思的哲学真理。因而马克思的“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价值先行”，继而重新“解释世界”，达到一种新的真理。

而马克思在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3]</sup>表明了上述真理的产生过程也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作为“发现新世界”的真理依然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步骤在于“改变世界”。从上述马克思的这两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循环，即作为先行在场的“价值立场”首先出现，因此才有必要“批判旧世界”，继而创造出一种新式的解释世界的“科学”，然后实现一种“改变世界”的价值实践。

## 二、被科学化了的真理

从上述讨论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的思想是作为一种“价值—真理—价值”的循环体存在的，它首先是基于一种价值立场而进行的批判，进而呈现给人们一种新的解释世界的真理，而这种解释世界的真理也仍只是其历史工作的一个环节，最终是为了实现一种价值实践。

我们常常批评教科书哲学片面地发展了马克思思想中作为“解释世界—真理”的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批判这种“解读—传播”模式也是片面地表述了马克思的思想。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教科书的理解与批判依然只是停留在理论内部，只是在“逻辑”上发现它的“纰漏”。我们指责教科书体系把马克思的“哲学”变成了“科学”，而既然是“科学”，那么按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明确观点来看，它依然只是停留在“解释世界”的传统水平上，因此这种“解读—传播”范式因而具有了反讽意味的“原罪”。

但我们不应该单就逻辑而逻辑，单就理论而理论。另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为何我们将马克思的思想表述成了“科学”？这催使我们去思考一个背后更加厚重的历史现实问题，应该看到这种理论的历史变与中国近现代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后年代，晚清的中国依然是这个世界屈指可数的强国，GDP居于当时世界的首位。然后由于闭关锁国，引起众资本主义国家的觊觎。鸦片战争使我们遭受了惨痛的失败，而后的甲午海战更是让这个国家雪上加霜。从这个历史时期开始，国人已经逐渐看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因而有必要为自己的这个国家进行“补课”，“师夷长技以制夷”。英国著名的中国学学者李约瑟曾经在1930年提出了一个以他名字冠名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时也就是一个令人警醒的结论，中国没有科学，而这造成了中国的百年积弱。

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1919年陈独秀提出要呼唤引进“赛先生”。摆在当时中国面前的问题一方面是本国的科学技术的羸弱，一方面是民众对封建迷信的信奉。这种国弱民愚催逼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另寻救亡之药方。这也以独特的中国式历史印证了马克思的那句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接连胜利，中国人逐渐地“站起来”了，在对旧世界的革命完成后，开始了对新世界的“改变”。而这时的国人已经更加明确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要想富国强民，必须要走一条现代科学技术之路。邓小平意识到中国必须要实现彻底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并提出了“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我们能够看到，从对旧世界的“废”，到对新世界的“兴”，科学一直占据着舞台的闪亮位置。

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曾经写道，“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这种问题同样摆在当时的中国面前，而科学的到来，为这一问题指明了出处。它不但可以批判旧世界，还可以解释新世界，创造新世界。

马克思同样明确地提到，“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sup>[19]</sup>这可以看做是马克思对于科学原理的一次宣言。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决定逻辑，当中国重新走向复兴的历史舞台，科学可谓“战功赫赫”，风光无处不在，因此一直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真理，也相应地被“处理”成了“科学”，成为被科学化了的真理。这个历史变没有必要褒贬，也无可指摘，背后一定有它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基础，并且曾经深得人心。

## 三、唯物主义与科学

这个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是教科书范式的起点问题和首要问题。它从恩格斯的判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进一步明确化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由此推演出了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变得“唯”、“物”，这与科学的“唯”、“客观—物”交相呼应。整个马克思思想在教科书体系下被塑造成了一种科学。来自科学的结论和思维方式分别在本体论层次和认识论层次对唯物主义给予“证明”，并因为上述科学之于中国近现代史之原因，科学有资格、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最佳的哲学注解。

这种被解释出来的唯物主义以“物”为逻辑起点，正如科学以“物”为研究对象，二者内在的亲合力使得唯物主义与科学逐渐成为一套“家族概念”，有着微妙的亲缘血脉。在马克思的思想重述中，更多的诸如“真理”“规律”字眼被反复提及和论述。唯物主义以隐喻的形式震荡了“物”的概念，将社会生产、生产方式等社会历史领域的一种客观存在纳入到旧的自然科学的“物”的概念下，唯物主义被论述为广义的科学，科学也成了精确的唯物主义代表。

从教科书的三大板块来看，“唯物主义—科学”这套家族概念始终贯穿其中。在所谓的哲学部分，科学参与论证了作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部分，马克思的思想被叙述为是正确的经济规律、理论；在社会主义部分，冠之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并在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对照中，彰显后者的“不科学”。而在丰富庞杂的马克思以及后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中，上述论述可谓不难找到可资引用的佐证。

在中华民族的凌弱、觉醒与复兴的道路上，赛先生（科学）是被热情地相邀而来的，也是被积极推广的。而作为哲学的唯物主义，作为哲学的马克思思想，也是同样受邀和推广。这是同一历史历程的两条主线索，二者也有着即离莫辨的复杂关系。而单纯由于今天的教科书哲学在后续的“推广”和“应用”上遭遇到了僵化与教条，并由此指责被科学化了的马克思哲学的“原罪”，那可能是忽略了中国独特的历史现实背景。单纯地从逻辑到逻辑的推演，从理论到理论的论证，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复杂问题。即，科学仍在途中，被叙述为科学的哲学何以能够“被拒斥”成功？

（下转第37页）

一大关键的原因。做事情之前,先看是否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盲目追随所谓的“民意”,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这也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如何加强执行?采用听证会的形式,阳光执行,使执行工作置于各方当事人的监督之下,加强执行工作的公信力,增加执行工作透明度,加强了对执行案件全程监督。加强执行队伍建设,提高执行队伍素质,增强责任感,为执行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建立顺畅的反馈渠道,明确每项任务的阶段负责人与总负责人。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设立“问题反馈箱”与“合理化建立箱”,对收集到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及时处理;对提出的好的建议,积极采纳。社会的管理者不仅仅是制定策略和下达命令,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执行力。如果社会管理者的执行力不足,而一个再完美的策略也会死在没有执行力的管理者手中。

#### (四) 监管保障

加强监管有助于防止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有助于防止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有助于促进维护农民工利益的制度、法律法规的执行。首先要完善问责制,加强公民问责,降低实施公民问责的“门槛”,增强对公民问责的支持和援助,给予公民问责以充分的保护和激励;加强舆论问责,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等大众传媒形成舆论问责。其次,要认真贯彻执行相关监管法律法规,如认真贯彻《劳动安全法》等

保障农民工利益的法律法规。再次要违法必究,加大惩罚力度,严肃处理恶意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不论是问责、法律的执行实施,关键还是要完善监管的长效机制,不能搞突击检查,要形成时时为农民工考虑,处处为他们着想的工作、生活环境。

完善利益诉求保障体系建设,保证农民工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利益,让农民工获得社会认同感,农民工的权利得到正常行使,农民工的权益得到良好保护,从而充分保护和调动农民工的劳动积极性,才能使他们在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建设中做出更大贡献,促进国家的繁荣稳定。

#### 参考文献:

- [1] 石学峰.着力建立健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J].求知,2009(6):7-9.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4]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99.
- [5] 塞缪尔·亨廷顿,等.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汪晓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1.
- [6] 杨正喜,唐鸣.论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J].中州学刊,2006(3):9-11.

(上接第21页)

## 四、科学、唯物主义与民主

的确,我们同样应该看到,今天对于教科书体系的指责的确有着自身的合理之所在。无论当初对马克思哲学“解读—叙述”的一味“科学化”,还是今天广泛的拒斥“科学化”的思维路向,都应看到其背后的历史现实。

当年被热情相邀而来的除了“赛先生”,还有“德先生”(民主)。民主之字面解释可以有两种,一是为民做主,一是民做主。慈禧的一句“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可谓是彻底的并带有讽刺意味的“为民做主”,因此我们能够看到老舍在小说里通过剧中人感慨“我爱我的大清国,可是谁爱我”的酸楚无奈。而另外的也就是真正的民主即民做主,“民”是绝对的主语。马克思曾把人民群众看做是历史的缔造者,也是批判旧世界的物质武器,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民主与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我们可以把科学、民主以及唯物主义看做是一个家族系统。

在这个家族系统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科学与民主的关联。赛先生与德先生应该是相伴而行相辅相成的关系,科学之于中国,一如民主之于中国。科学甚至本身就是民主的,它向国人告明,无需依靠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靠中国民众自己。来自自然、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进驻了中华大地,科学开始成就中华民族,引领着中华民族反抗列强的凌辱,实现新的崛起。

然而在另外一条需要冷眼审视的线索上,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成全了人,也在压制着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新时期奋斗中,来自科学的理性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催逼着人的“奋斗”,在一个崛起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仿佛被放进一个巨型的运作精微的社会机器之中。在这个运作中,人某种程度被再一次压制。这是一个难以逃避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人们担负着个人奋斗与国家振兴的双重使命,也的确不乏有人迷失了精神的哲学式自我。

在这样的历史现实背景下,科学也在“革命”的风光之外透显出一丝“反革命(哈耶克语)”的气息,因此,反应在哲学思潮中,就有必要提出一种拒斥科学的敏锐把脉。这种思潮反应在对于马克思思想的重新把握中,由此牵连的“科学—唯物主义—民主”的家族概念群也统统遭受到了新的反思和挑战。当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反革命”意味的科学,继而变成了“科学神”,人再次被压抑。当年马克思的思想位置就是站在对神学的批评完成了之后的,他要将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的批判,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诡异的重演,当科学变成了“科学神”,当人被一种强大的科学理性进行着一场非理性的压制,对“神”的批判就显得尤有必要了。因此,这场发生在对教科书哲学进行批判的表象,可以看做是唯物主义内部发生了天人交战。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